


日本 佛 教源流

韦立新 任 萍◎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1工程”
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子项目立项资助（GDUFS211-1-086）

日本 佛 教源流

韦立新 任萍◎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佛教源流 / 韦立新, 任萍编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 2013.2

ISBN 978-7-5100-5711-3

I. ①日… II. ①韦… ②任… III. ①佛教史—研究
—日本 IV. ①B94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3559 号

日本佛教源流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8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711-3/B · 0057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佛教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之后，虽然也曾一度遭遇了大和朝廷中固守传统、力主排佛的保守势力的百般阻挠和反对，但最终因当时欲引入并借助大陆先进文化以振兴国家的大势所趋，在时任摄政的圣德太子的推动下，迅速一度成为了日本的“国教”。其后一直作为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给日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日本人的生活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不仅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构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杨曾文先生在其《日本佛教史》（新版）序中所言，“正因为佛教在日本历史上曾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以在回顾和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的时候，不能不接触到佛教，写日本古代史、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都必须联系到佛教，甚至把它作为重要内容。”了解和研究日本佛教及其历史源流，对于理解和认识日本人及日本文化，了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而更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整个东亚文明，无疑有着非常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时至今日，在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方面，中外都不乏权威的研究成果问世。笔者虽然一直对中日佛教文化关系、佛教文化交流史、日本禅宗史饶有兴趣，也曾尝试过围绕宋元时期“中国禅的东传与日本禅的形成和发展”而展开的两国佛教文化关系做一些粗浅的探讨和研究，并不自量力地勉力付梓（《宋元时期中日佛教文化关系》，香港开益出版社2003版），但作为对日本佛教及其发展历史颇感兴趣的后来者，既无深厚而足够的研究积淀，也无更多的独到见解足以催生出更有价值的日本佛教史来，因此只能以概述的形式，将自以为应该或值得提起的人物和事件作简略记述。同时，为更好把握日本佛教文化，了解其源流，对其史上各个时期形成的宗派，活跃在史上的重要人物及主要事迹，以及古今著名寺院、重要佛教著作都分设章节加以介绍。关于日本人撰写的重要佛教著作部分，经笔者考据远不止书中所列，但因其中有不少著述在《诸宗章疏目录》（《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九十五卷）里虽有记载，却并无现存，故在本书中暂作舍弃不记处理。

本书佛教史概述部分对“古”的源流部分显得略有偏重，而似乎在对近现代部分的记述方面略显粗略，给人以“厚古薄今”之感。这也许与笔者的偏爱有一



定关系。但是，该书既然名为“日本佛教源流”，并旨在让读者从佛教史、佛教文化的角度去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把握日本文化，则自然应该对在日本文化形成和构建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源流”部分有所偏重，这应该是情有可原的吧。但愿读者能借助此书，对日本佛教文化的源流有所了解，从而加深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另外，作为日本佛教史的概述，既然不允许用足够的篇幅来进行详细而全面的记述，就唯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取舍。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对日本佛教史上的史实和人物的取舍和把握，或对同一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和解读，都将必然或多或少地掺杂有作者的主观成分，正如学问、见解上的见仁见智一样，窃以为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尽管笔者力求尽可能客观地把日本佛教史的概貌展现给读者，但仍然难免有所偏颇或遗漏，还请读者包涵并批评指正。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日本佛教史概述 | 001 |
|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 001 |
| 第二节 奈良佛教 | 005 |
| 第三节 平安佛教 | 012 |
| 第四节 中世佛教 | 022 |
| 第五节 近世佛教 | 036 |
| 第六节 近现代佛教 | 040 |
| 第二章 日本佛教宗派 | 051 |
| 第一节 天台宗 | 051 |
| 第二节 真言宗 | 052 |
| 第三节 净土宗 | 054 |
| 第四节 净土真宗 | 055 |
| 第五节 临济宗 | 056 |
| 第六节 曹洞宗 | 058 |
| 第七节 黄檗宗 | 059 |
| 第八节 日莲宗 | 061 |
| 第九节 时宗 | 062 |
| 第十节 融通念佛宗 | 063 |
| 第十一节 法相宗 | 064 |
| 第十二节 华严宗 | 065 |
| 第十三节 律宗 | 067 |
| 第十四节 修验道 | 068 |
| 第十五节 南都六宗 | 069 |
| 第十六节 新兴宗教 | 071 |
| 第三章 日本佛教史上重要人物 | 074 |
| 圣德太子 惠慈 旻 役小角 定惠 泰澄 景戒 广智 胜道 玄宾 义真 玄睿 义渊 行基 实惠 光定 道慈 道昭 智凤 最澄 空海 德一 玄昉 良辩 鉴真 道镜 善珠 圆仁 圆珍 圣宝 真济 常晓 圆行 宗睿 安然 | |



真然 宽朝 空也 良源 庆滋保胤 源信 皇庆 齋然 寂照 成寻 永观
良忍 觉猷 觉鑊 皇圆 觉阿 文觉 重源 源空 荣西 慈圆 亲鸾 觉禅
贞庆 明遍 辩长 俊苾 证空 县照 高辨 道元 睿尊 高峰显日 日莲
荣朝 退耕行勇 圣觉 明全 宗性 凝然 兰溪道隆 圆尔 孤云怀奘 一遍
南浦绍明 宗峰妙超 清拙正澄 莹山绍瑾 一山一宁 雪村友梅 虎关师炼
梦窗疏石 智光 关山慧玄 无学祖元 兀庵普宁 大日能忍 无本觉心
大休正念 春屋妙葩 义堂周信 绝海中津 中岩圆月 满济 一休宗纯
莲如 横川景三 显如 隐元 卮元师蛮 隆光 白隐慧鹤

第四章 日本古今著名寺院..... 101

安国寺 安详寺 宝严寺 本能寺 本法寺 本隆寺 本莲寺 本门寺 本妙寺
本应寺 比苏山寺 禅林寺 长乐寺 长学寺 长谷寺 慈照寺 崇福寺
传法院 大安寺 大乘寺 大德寺 大觉寺 大念佛寺 大石寺 大树寺
当麻寺 东大寺 东寺 东本愿寺 东福寺 法成寺 法华寺 法界寺 法隆寺
法轮寺 法起寺 佛光寺 佛向寺 高山寺 高雄山寺 根来寺 广隆寺
光明寺 光明山寺 光运寺 桂宫院 观世音寺 海藏寺 弘经寺 欢喜光寺
华严寺 慧日寺 极乐寺 建长寺 建仁寺 金仓寺 金刚峰寺 金光寺
金莲寺 净琉璃寺 净妙寺 净智寺 久远寺 宽永寺 来迎院 莲华寺
六波罗蜜寺 龙安寺 鹿苑寺(金阁寺) 轮王寺 妙本寺 妙光寺 妙觉寺
妙显寺 妙心寺 明王院 南禅寺 平等院 浅草寺 清澄寺 清浄光寺 清水寺
青莲院 劝修寺 泉涌寺 壬生寺 日光轮王寺 仁和寺 瑞龙寺 瑞圣寺
如愿寺 三宝寺 三千院 善导寺 善水寺 深大寺 神护寺 神野寺 胜林院
胜光寺 石山寺 寿福寺 双林寺 四天王寺 唐招提寺 醍醐寺 天龙寺
万福寺 万寿寺 往生院 无量光寺 西本愿寺 西大寺 西芳寺 西光寺
西园寺 相国寺 蟹满寺 新善光寺(善光寺) 兴福寺 兴国寺 兴圣寺
修禅寺 学养寺 药师寺 岩船寺 延历寺 野中寺 银阁寺 永光寺 永平寺
园城寺 圆觉寺 圆满院 元庆寺 元兴寺(法兴寺、飞鸟寺) 云居寺 增上寺
贞观寺(嘉祥寺西院) 正法寺 知恩院 智积院 中宫寺 中尊寺 总持院

第五章 日本人撰写的重要佛教著作..... 141

《辩显密二教论》 《传光录》 《西域传灯目录》 《法华秀句》 《佛性抄》
《扶桑略记》 《观心本尊抄》 《教时问答》 《教行信证》 《净土源流章》
《觉禅抄》 《开目抄》 《立正安国论》 《秘藏宝钥》 《弥勒讲式》
《明义进行集》 《普劝坐禅仪》 《日本洞上联灯录》 《日本高僧传要文抄》

| | | | |
|---------------|-----------|----------|------------|
| 《日本灵异记》 | 《日本往生极乐记》 | 《三代实录》 |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 |
| 《三教鼎足论》 | 《三教一致之辨》 | 《三教指归》 | 《三论大义抄》 |
| 《沙石集》 | 《十善法语》 | 《十住心论》 | 《守护国界章》 |
| 《天台法华宗义集》 | 《往生讲式》 | 《往生要集》 | 《唯信抄》 |
| 《五轮九字明秘密释》 | 《显戒论》 | 《兴禅护国论》 | 《选择本愿念佛集》 |
| 《续日本高僧传》 | 《延宝传灯录》 | 《一心戒文》 | 《永平清规》 |
| 《元亨释书》 | 《真禅融心义》 | 《真言宗教时义》 | 《正法眼藏》 |
| 《正法眼藏随问记》 | | | |
| 附录一：日本佛教史大事年表 | 152 | | |
| 附录二：主要参考文献 | 163 | | |
| 后 记 | 171 | | |

第一章 日本佛教史概述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说起日本佛教的历史，一般以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中国、朝鲜传入日本时算起。概而言之，即前5—前4世纪草创于印度，在1—2世纪时传入中国，至4世纪后半期传至朝鲜半岛诸国，再于6世纪前半期传入日本。至于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则因其说法莫衷一是，且各有理据，^[1]所以通常我们只说其初传于6世纪前半期。实际上，除了百济圣明王派使者进献佛像、经论等物之史实外，因日本与中国及朝鲜半岛诸国早已往来频繁，且还有不少其他的官方“公传”及民间“私传”的历史记载，^[2]因此，也有人认为佛教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已经传入日本。

一、佛教传入前的宗教思想

尽管有学者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远古时代的日本人“多少有点缺乏宗教思想”^[3]，但其实他们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有着其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一般来说，“原始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生与死”、“灵与肉”、“现世与来世”等问题上。

从发掘出土的“屈葬人骨”，我们可推测出绳纹文化时代人对死灵的畏惧和防范，由在北九州出土的“瓮棺葬”、“石棺葬”遗址中的陪葬品，可想到弥生文化时代人除了恐惧之外，已开始产生祭祀、抚慰死灵的意识；再由陪葬品中开始出现武具、马具、食器等实用性极强的物品，不难得知其来世信仰思想已经萌芽。

通过特有的祭祀、祈祷和抚慰方式，使祖先死后游魂都变成“善灵”以庇护

[1] 据史料记载有来自百济、新罗和高句丽等不同的传入途径，通常以通过官方（朝廷）途径传入的所谓“公传”时间算起，即以百济圣明王派使者献金铜佛像、经论等并上表赞颂佛法这一史实所发生的年代为佛教正式传入日本的时间。但即便如此，对该史实发生的年代的记载也有不同，既有记载为钦明天皇十三年（552）（《日本书纪》）的，也有记载为钦明天皇七年（538）（《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的，尚无绝对权威定论。不过，最近学界认为《日本书纪》编造、润色痕迹明显，可信度不高而倾向于认同后者。

[2] 如《扶桑略记》记载汉人鞍部司马达等于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来到大和，在草堂上安置佛像礼拜，时人颇感诧异等。

[3]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子孙，使各类天神地祇等自然神灵都平息怨怒而停止作祟，欣然保佑现世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以说，这就是佛教传入之前日本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其主要体现在各种自然崇拜与氏族神（祖先神）信仰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上，也就是后来的所谓“神道”的最原始思想。

二、奉佛与排佛之争

尽管有记载表明佛教可能在更早时期已经通过民间“私传”途径进入日本，^[1]但当百济国圣明王作为对日外交政策的一环，正式派遣使者进献金铜释迦佛像、幡盖、经纶等，以献“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之妙法向大和朝廷示好时，仍然在当时朝廷上引发了应否接纳此外来“蕃神”之争。

据《日本书纪》卷十九记载：

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诏使者云：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决。乃历问群臣曰：西蕃献佛，相貌端严，全未曾看，可礼以不？苏我大臣稻目宿祢奏曰：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物部大连尾舆、中臣连镰子同奏曰：我国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国神之怒。

由此可知，奉佛派大臣苏我稻目以信佛乃是大势所趋，“西蕃诸国”皆已信奉为由力主接纳，而排佛派大连物部尾舆等人则以“恐致国神之怒”为由强烈反对佛教传播。

其实，苏我、物部二氏均为国家旧臣，共同参与朝政，围绕着内政与外交的主导权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势不两立之争由来已久。因此，奉佛与排佛之争，既是二氏由来已久的争权夺利的又一体现，同时也可看作是欲凭借固有的氏族神信仰以加强氏族团结的“保守势力”，与欲积极引入并借助外来的大陆文化和“归化人”势力以增强实力的“开明势力”的博弈。

钦明天皇虽对百济王遣使送来妙法“欢喜踊跃”，但因物部等人强烈反对，只好把佛像等物赠与苏我稻目“试令礼拜”（《日本书纪》卷十九）。稻目将佛像安置于家中，并建向原寺^[2]虔诚供奉。不想此后疫病流行，病死者众，物部尾舆等人于是趁机参奏天皇：“昔日不须臣计，致斯病死。今不远而复，必当有庆。宜早投弃，勤求后福！”（《日本书纪》卷十九），并获准奏放火焚毁佛寺，将佛像投入难波堀江中。在苏我稻目死后的敏达天皇十四年（585），其子苏我马

[1] 如《扶桑略记》关于汉人鞍部司马达等于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来到大和，在草堂上安置佛像礼拜等的记载。

[2] 据传为日本最初的佛寺，于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丰浦有遗址。苏我稻目一开始在此安置佛像，后于推古天皇时移至丰浦，改称丰浦寺。该故地现存有净土真宗广严寺。

子又因病获准供奉佛像以“乞延寿命”，并在此前一年在石川的家宅建造了佛寺，迎请善信尼及其弟子二人在此修法^[1]，不巧又遇疫病流行，再次遭到物部氏等人参奏天皇，惨遭毁寺灭佛之灾^[2]。

尽管如此，正如前面所述，该时期日本与中国及朝鲜半岛诸国早已往来频繁，佛教三宝不断自百济、高句丽东传而来，皇室和贵族当中信佛者日增。至苏我氏除掉物部氏夺势专权以后，不仅来日僧侣及造寺工匠愈来愈多，受戒出家者亦日呈上升之势。另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记载，推古天皇于二年（594）二月“诏皇太子及大臣，令兴隆三宝”，随着难波黄陵山上四天王寺、飞鸟（今奈良高市郡明日香町）法兴寺等的相继建成，来日高僧讲经弘法者日众，佛教越发兴隆，奉佛已成大势所趋。

三、圣德太子的思想及其功绩

圣德太子（574—622）是一位深受日本人景仰的重要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史料为数不少，除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外，还有《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圣德太子传历》、《上宫太子御记》、《上宫皇太子菩萨传》、《七代记》等，尽管各类史料所记不尽一致，且有许多事迹实际上是缺乏确凿佐证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其在日本历史、日本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有口皆碑的。

他生于敏达天皇三年，为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据传，他“习内教于高句丽僧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日本书纪》卷二十二）。另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

上宫王师高丽惠慈法师。王命能悟《涅槃》常住五种佛性之理，明开《法华》三车权实二智之趣，通达《维摩》不思议解脱之宗，且知经部、萨婆多两家之辨，亦知三玄、五经之旨。并照天文地理之道，即造《法华》等经疏七卷，号曰上宫御制疏。

由此可知，他不仅通佛经、解佛法，还懂儒家五经、道家“三玄，^[3]”于天文地理亦颇有造诣。

圣德太子自幼受大陆汉文化的熏陶，同时还有可能受到祖母坚盐媛（苏我稻目之女）的影响，从小接触从百济等国传来的佛教经典书籍，加上其不凡身世^[4]，对来自大陆的佛教思想自有其独到感受和理解。据传，他曾赠言妃子橘太

[1] 司马达等的女儿司马岛，十一岁从高句丽比丘尼惠便、法明出家，曾往百济受戒，号“善信尼”。

[2] 日本佛教史上称此灭佛事件为“乙巳法难”。

[3] 指《老子》、《庄子》和《周易》。

[4] 年轻丧父（用明天皇），后又遇叔父崇峻天皇惨遭苏我马子弑杀之不测。



郎女曰“世间虚假，唯佛是真”（天寿国绣帐铭），临终时曾告诫山背大兄王等“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日本书纪》），无一不显示出他对佛教真谛理解颇深。推古天皇^[1]即位（593）以后，时年二十岁的圣德太子即任摄政，被委以“总摄万机，行天皇事”（《日本书纪》卷二十一）之大权。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不仅皇室、朝廷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再消极或摇摆不定，使佛教得以正式作为国家宗教确立下来，各方豪族也都竞相捐资建佛寺铸佛像，以期积德结缘于三宝。推古天皇三年时，高句丽僧人惠慈、百济僧人惠聪来到日本，为在日本弘传佛法贡献良多。其中惠慈作为圣德太子的佛教之师，于太子在佛教理解和造詣方面影响极大。据传惠慈回国之后，在母国听闻太子辞世讣告时悲痛不已，立意次年同月同日往赴净土与太子相见，后来果然如约践行此诺，令天下为之动容。

圣德太子在日本佛教史上最大功绩，概而言之有以下三点：其一，通过制定宪法十七条^[2]，号召全国上下“笃敬三宝”，所有臣民信奉佛教，使佛教得以在日本顺利传播和发展。制定于推古十二年（604）的十七条宪法，第二条明确要求“应崇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其二，在推古十五年七月、十六年四月两度派小野妹子为使赴中国隋朝联系邦交，求取经论，开辟了与中国的交通往来。其三，他多次奉敕在宫中宣讲《法华经》、《胜鬘经》等，并在讲经释论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理解、注释撰成《三经义疏》^[3]，身体力行地弘扬佛教。

四、大化改新与兴隆佛教

由于自中国隋唐留学归来的日本留学僧积极参与大化革新，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当时的日本得以引进完备的隋唐政治和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了新型的、进步的社会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文化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在获得朝廷的有利庇护和支持下，佛教终于几经波折后得以在日本确立稳固的地位，并获得较大的发展。

为更好地兴隆佛教以镇护国家、护佑国民，天皇于大化之年（645）亲下诏书，诏令曾留学隋唐的僧旻、惠云、常安等“十师”担负“教导众僧，修行释教”之重任。传入日本不久的佛教，尽管在当时其教理、教义尚未能真正为人所理解，故

[1]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上记载的6世纪末、7世纪初的天皇，为日本最初的女帝，钦明天皇的第三皇女，其母坚盐媛为苏我稻目之女。专权和蛮横的苏我马子在暗杀了对自己不满意的崇峻天皇之后即立她为帝。

[2] 尽管学界不乏认为宪法十七条并非圣德太子所作之说，但本书仍倾向于归功于他。

[3] 即《法华经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学界有认为《三经义疏》乃伪撰之说，至今尚无定论，但总的来说肯定为圣德太子所著的看法略占上风。

绝大多数人只停留于为死者祈愿冥福而信佛，但因其信奉者多以皇室公卿贵族为主，加之当时普遍认为信佛可以招福消灾，故在早期的佛教兴隆事业当中，更多的是投入人力、财力、物力于大力兴建寺院、铸造佛像方面。加上经过“奉佛与排佛之争”告一段落之后，信奉佛教以为“护国”之观念已占绝对上风，以天皇为首的朝廷贵族们为祈求佛、菩萨保佑日本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动员大量民众，投入举国之财力来建造寺院、铸造佛像等，佛教一时呈现兴隆景象。据记载，推古天皇（624）派人校验当时的佛寺和僧尼时，全国有寺院四十六所，僧八百一十六人，尼五百六十九人，合共一千三百八十五人。而至持统天皇六年（692）时，寺院数已增至五百四十五所，尽管当时僧尼数量未及把握，但在持统天皇四年（690）时，仅京内七所寺院的僧人数已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人，^[1]由此可推测出当时佛教兴隆之势。

第二节 奈良佛教

（710—794）

在日本史上，自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京（奈良），直到794年迁都平安为止的时代，称为奈良时代。由于在前一个时代里，日本积极引入了隋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参照其制定和颁布了不少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律令^[2]，再经过“大化改新”的一系列改革，使得该时期呈现出国家体制及社会制度相当完备，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以天皇为首的统治阶级牢牢掌握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主导权的主要特征。

一、日本佛教在奈良时期的特殊地位

在朝廷的大力扶持和保护下，佛教不仅牢固确立了其作为“镇护国家”之教的特殊地位，还获得了稳步的发展。据传圣德太子就曾以皇子之尊亲披袈裟讲解佛经，当时以天皇、皇子身份剃发出家或剃发受戒者亦不乏其人。^[3]日本佛教在该时期的特殊地位，还有如下三件典型事例为证。

（一）天皇亲自下诏创建国分寺

本来，壬申之乱（672）以后，朝廷制定并颁布了诸如僧尼令、僧纲、国师制等相关的法令和制度，既严禁僧尼参与或过问政治，限定其宗教活动范围不能

[1] 参见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 如天智天皇时期的《近江令》（668）、天武、持统天皇时期的《净御原朝廷之令》（689）、文武天皇时期的《大宝令》（701）、元正天皇时期的《养老令》（718）等。

[3] 如天平20年（748）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由行基菩萨主持受戒，天皇法名胜满，皇后法名满福，皇太后法名德满。



超出寺院以外，同时设立了由僧纲管辖京内，由国师管理地方诸国的僧尼和寺院的“僧官制”，并由国家统一来掌管僧尼的得度、受戒等权限。这种典型的“官寺佛教制度”，的确起到了将佛教置于中央集权国家律令体制的有效管制之下的作用。但后来却遭遇了疫病流行、饥馑发生、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迫于如此情势，为借助佛教保佑国家太平、社会稳定，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三年（741）二月四日亲自下诏在各国设立“国分寺”、“国分尼寺”，并于天平十五年（743）发愿并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兴建金铜卢舍那大佛，进一步完善了以东大寺为中心，各国分设国分寺、国分尼寺的“官寺佛教体制”。

（二）起用行基化募建造大佛像

奈良时代著名僧人行基（668—749），因遍游诸国教化民众，并多行架桥修路筑堤之善举，慕名追随而来之民众动辄数以千计，以致引起朝廷的戒备和不满。朝廷曾于养老元年（717）下诏以“妄说罪福，合构朋党，（中略）强乞余物，诈称圣道，妖惑百姓”（《续日本纪》）之罪名对其传教活动加以禁止，但后来却迫于形势所需，利用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在民间化缘募集资金以兴建大佛像。并于天平七年（745）敕任其为大僧正。圣武天皇还于天平二十一年（749）从其受菩萨戒，并赐以“大菩萨”号。

（三）僧人受宠并参与朝政

奈良时代著名法相宗僧人玄昉（？—746）和道境（？—772），因受到笃信佛教的天皇家族的敬重和宠爱，曾一度被委以重任，身居高位参与朝政，并导致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这既被视为奈良时代佛教僧侣腐败堕落的典型事例，同时也被当做日本佛教曾一度与政治密不可分的佐证事例，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二、奈良佛教的宗派

奈良佛教，一般指奈良时期兴盛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因奈良位于平安（京都）之南，故又称为南都六宗、南都佛教。由于当时律令政府有意加强对僧尼的统一管制，严格控制僧尼四处游走、乞食传教，而倡导和鼓励各宗推举佛学高僧为宗师，在各自寺院指导并组织僧徒开展佛学研习和研究，故该时期佛学研究特别兴盛。以各大寺院为主要据点，僧尼们除了诵读经典外，还结成不少以讲经、交流佛学研究心得为主的佛学团体。因此，一般认为该时期的佛教六宗，与其说是宗派，倒毋宁说是学团、学派更为恰当。

（一）三论宗和成实宗

三论宗古时又称“三论众”，以主要研习印度的龙树^[1]的《中论》、《十二门论》以及据传为龙树弟子的提婆的《百论》而得名。至隋末唐初的吉藏（549—623）时，集三论学说之大成正式成立三论宗。因佛教传入日本时，自朝鲜半岛诸国来日僧人不少，据传其中大部分是继承了三论宗学说者，但具体何人何时宣扬何种教义均无法考证，一般根据圣德太子所著《三经义疏》中引用的提婆的空宗思想，推测其师高句丽僧慧慈应属三论宗系统。再就是推古朝三十三年（625）来日的高句丽僧慧灌，据传曾“入隋受嘉祥吉藏三论之旨”（《元亨释书》），来日本时适逢大旱，于是奉旨讲“三论”求雨，结果因求雨灵验受敬重而获任命为僧正。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他再奉旨在宫中讲解“三论”，从此日本三论宗日渐兴隆，慧灌因此被视为日本三论宗的初传。三论宗的形成，标志着日本从此开始出现佛教宗派。

慧灌门下出了不少高僧，多数曾赴中国唐朝求得正法归国并获任命为僧正。其中尤以智藏出名，赴唐学三论归国后居法隆寺弘传该宗教义，被视为日本三论宗第二传。其门下高徒道慈，于大宝元年（701）乘遣唐使船入唐，不仅从吉藏的法孙元康学习三论，还历访各宗名僧求法而归。据传其不仅弘传三论，而且以“三论为本，兼弘法相、真言等宗”（《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为日本传入六宗立下汗马功劳，被奉为日本三论三祖。

成实宗起源于印度，其教义主要依据印度的诃梨跋摩的《成实论》，在起源及教义上与三论宗相去不远，亦认为一切皆空，主张以“四谛八正道”达至涅槃。相对于三论宗有“大乘空宗”之称，成实宗又被称为“小乘空宗”，在传入中国、日本时，往往都依附于三论宗。早期传入三论教义之高僧，如高句丽惠慈、慧观，百济慧聪、观勒等人均兼通成实学说，在讲习、传授三论学说的同时，有时不免兼讲或联系到《成实论》。当时传授和研习三论学说的著名寺院，如元兴寺、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其所结成的佛学团体多数都兼习成实之学说，故成实宗在日本实际上并未成独立之宗派。

（二）法相宗和俱舍宗

法相宗是由唐玄奘（602—664）及其高徒窥基（632—682）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主要依据《解深密经》和《唯识论》等经典，继承了印度的唯识派教义，认为一切存在均为心、识之作用所致，是“空虚”而绝非“实在”，又称唯识宗。在三论宗传入日本经过三十年后，由道昭（629—700）在齐明天皇（655—660）

[1] 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之祖。据传还著有《大智度论》和提倡易行道的《十住毘婆沙论》、密教的《释摩诃衍论》等，故又被称为“八宗祖师”。



时期传入。道昭因此被视为日本法相宗第一传。他曾于白雉四年（653）随遣唐使赴唐居住七年，师从玄奘三藏研习法相唯识教义，同时兼学禅宗，归国后住元兴寺弘法，并周游各地，一边传教，一边为民凿井汲水、设船摆渡等。于文武四年（700）七十二岁时圆寂于元兴寺禅院，由其弟子遵从其遗言举行了日本首次火葬。

在道昭赴唐后的第五年，即齐明天皇四年（658）七月，智通、智达乘坐新罗船入唐，师从玄奘和窥基学习正宗法相教义，归国后以元兴寺为据点传布法相教义，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以上第一、第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传法中心，故在日本佛教史上合称为“元兴寺传”^[1]或“南寺传”。日本法相宗之第三传，乃是由于大宝三年（703）奉旨入唐的新罗僧智凤、智鸾、智雄。他们在唐期间跟随玄奘的再传弟子智周^[2]（669—723）学习唯识教义，归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传法。再有于养老元年（717）随遣唐使入唐求法，于天平七年（735）携大量经论章疏回国，住兴福寺弘传法相教义的玄昉，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传。因第三、第四传均受教于智周，归朝后都以兴福寺为传法中心，故史称“北寺传”或“兴福寺传”。玄昉因消灭招福和为皇太夫人宫子治病效果灵验而备受朝廷宠信，一度身居高位，自由出入朝廷、参与朝政，最后引发史上“藤原广嗣之乱”^[3]，成为日本佛教史上出名人物，在此不作细表。

俱舍宗与法相宗同起源于印度，主要依据印度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而创立。该书被视为集小乘佛教教理之大成，由将法相宗传入中国的唐玄奘翻译流传，且其基本教义与法相宗大致相通，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基本上都是被当做法相宗的附宗加以传授和研习。

奈良时期的法相宗，还有两位值得一提的高僧，一位是南寺系统的行基（668—749），另一位是北寺系统的义渊（？—728）。

行基俗姓高志，十五岁出家入药师寺，后投道昭、义渊门下学佛。如前所述，曾不顾当时《僧尼令》之禁周游各地传教，同时组织信徒开荒修路、架桥筑堤、治病救人等，所到之处追随者众。有记载曰：“基之所过，耕夫舍耒耜，织妇投机杼，奔波礼谒，村里阗咽，而不容往来。”（《元亨释书》卷十四）据传由他组织兴建的寺院，仅畿内地区就有六十九所之多。圣武天皇（724—748）时期，他号召、率领信众四处奔走化募，力助天皇兴建东大寺、国分寺，因功德无量而获敕任大僧正，还亲任天皇、皇后、皇太后剃发出家戒师。据传由其授戒的弟子

[1] 因元兴寺位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区，故又称“飞鸟传”。

[2] 被视为法相宗在窥基之后研究唯识教义成就最高的名僧，著有《成唯识论演秘》、《成唯识论了义灯记》、《成唯识论枢要记》等。

[3] 天平十二年（740），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因不满僧人玄昉、吉备真备在朝专权跋扈，为除掉二人于北九州起兵叛乱，终被镇压。史称“藤原广嗣之乱”。

多达三千余人。^[1]

义渊俗姓市往氏，父母情况不详，自幼被天智天皇收养，后奉旨出家，师从智凤学佛。由于其德行高深，门下高徒名僧辈出，受到天智、天武、持统、文武、元明、元正、圣武七朝天皇的敬重。奈良时期的法相宗自他以后获得了发扬光大。

（三）华严宗与东大寺

与依据“论部”创立的“论宗”和依据“律部”创立的“律宗”不同，华严宗是奈良六宗当中唯一依据“经部”（《华严经》）创立的大乘佛教。

在中国，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聚集在一起诵读《华严经》，并共同研习该经的学派团体。后由唐代法藏（643—712）根据《华严经》集大成正式创立华严宗。据传在道璇^[2]（702—760）携华严章疏来到日本之前的养老年间（714—723），天皇曾让人誊写《华严经》以为先人祈愿冥福。^[3]道璇于天平八年（736）赴日时虽携带不少《华严经》章疏，但并未正式讲经传教。至天平十二年（740），由良辨僧正奏请圣武天皇以敕召请审祥^[4]正式开讲《华严经》。此被视为日本华严宗的正式开创，审祥为第一祖，良辨被视为第二祖。

当时的圣武天皇眼见邻国新罗佛教隆盛，愈发坚定了大兴佛教以治国安邦的决心。据传天皇特别尊崇华严宗，于天平十二年（740）行幸河内知识寺参拜卢舍那佛时，就起了重造卢舍那大佛像的念头。天平十三年（741）二月十四日，天皇正式下诏，命各地择最佳地点建国分寺、国分尼寺，并重申建造丈六佛像和七层塔的旨意。再于天平十五年（743）十月，正式发布铸造毗卢舍那大佛像的诏书曰：

有天下财富者朕也，有天下权势者亦朕也。以此财富权势而造此佛像，事成易，心至则难。唯恐徒劳人力，不能感圣，或生诽谤，反陷罪辜。是故有智之人，恳发至诚，可招祥福。^[5]

东大寺是华严宗的总寺院（总本山），又称大华严寺、总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作为统辖各地国分寺的中心所在，同时又寄托着天皇兴隆佛教以镇护国家、保佑子民的夙愿，其建造自然受到天皇及其家族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据传统籍尼寺的法华寺就是由皇太后宫子施舍其宫殿改建成为尼寺的。另外，天

[1]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页。

[2] 学界大多以道璇为最初将华严章疏传入日本者。

[3]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页。

[4] 长期以来，认为审祥乃新罗僧人，赴唐从法藏学法之后来到日本，住大安寺弘法的说法占主流，但最近学界似乎倾向于认为审祥乃大安寺僧人，赴新罗留学，研习华严教义归国后应邀开讲《华严经》。

[5] 转引自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